

CAMBRIDGE

比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美] 丹尼尔·C·哈林
Daniel C. Hallin

/ 著

[意] 保罗·曼奇尼
Paolo Mancini

陈娟 展江 等 / 译

比 较 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美] 丹尼尔·C·哈林

Daniel C. Hallin

[意] 保罗·曼奇尼

Paolo Mancini

著

陈娟 展江等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媒介体制/ (美) 哈林, (意) 曼奇尼著; 陈娟、展江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9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14139-8

I. ①比… II. ①哈…②曼…③陈…④展… III. ①新闻-传播媒介-对比研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494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

[美] 丹尼尔·C·哈林 著

[意] 保罗·曼奇尼

陈娟 展江 等 译

Bijiao Meijie Ti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1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魅。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



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画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未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译者序

平心而论，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是本人所主持翻译的难度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著作。由于作者在传播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由于本书在理论发展上的贡献，由于本书的学术水平以及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的陌生程度，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其精华实非易事，所以本人只能尝试着梳理和介绍本书的基本理论和学术价值。

一、《传媒的四种理论》为什么该被体面地安葬了？

早在1956年，三个美国学者西伯特（Siebert）、彼得森（Peterson）和施拉姆（Schramm）就推出了如今名闻遐迩的对世界媒介体制研究的探索性著述《传媒的四种理论》，但是比较研究在国际政治传播学界真正崭露头角，只是近年来的新发展。其中关键性的作品之一，就是由丹尼尔·哈林和保罗·曼奇尼这一对美国 and 意大利政治科学家组成的跨国学术搭档推出的《比较媒介体制》（2004）。

如同《传媒的四种理论》的地位一样，《比较媒介体制》也是探究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的关联性的一次系统性尝试。它首先提出的，仍然是与《传媒的四种理论》近半个世纪前开篇就提出的相同问题：“传媒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它的表现形式存在极大差别？”然而，哈林和曼奇尼恰恰认为，这两本著作是有根本性差异的，他们的力作足以结束《传媒的四种理论》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因此他们在书中难得诙谐打趣而不失礼貌地指出：

就像是恐怖电影中的一具僵尸一样，《传媒的四种理论》在媒介研究的景观带中风光了数十年，超过了它的自然寿限。我们认为，现在是为它举行体面的葬礼，转而发展出基于真正的比较研究的更高级模式的时候了。

何出此言？首先，哈林和曼奇尼认为，《传媒的四种理论》是规范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其“问题之一是其范畴如此之广，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流于表面，就像一幅对比十分强烈的照片，它遮蔽了太多我们需要观看的细节”；它“如此执迷于美国和苏联模式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至于几乎不给全世界媒介体制的多样性留下空间。例如，在追溯四种理论的源头时，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所列举的基本不外乎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苏联”；“聚焦于媒介‘哲学’——或者有人可能称之为媒介‘意识形态’——在我们看来，是《传媒的四种理论》关键性的败笔所在”。因此，它“貌似具有比较性，但事实上并不是基于比较分析的”。

其次，虽然《传媒的四种理论》自出版后一纸风行，但是2004年时，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上的比较媒介研究进展十分有限。哈林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博士（1980），自那时起的20多年来，他的研究旨趣是基于经验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先后关注和论述过越南战争中的媒介、拉美媒介、美国大选中的电视报道以及媒介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等主题。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与意大利同行保罗·曼奇尼合作。

哈林发现，比较媒介研究长期乏善可陈。他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我初入传播领域时，没有任何比较研究的传统。人们期待美国的每个政治科学系都有一个日本政治班、一个法国政治班、一个非洲政治班，但是那种事情不存在于传播学系。那是令人非常讶异的。与此同时，从事比较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人从不研究媒介，即便没有理由认为媒介对于他们所讨论的东西实际上也许是关键性的。他们根本不研究它，所以它真的是姗姗来迟。”“我们明白了，比较媒介研究领域存在这样一种鸿沟——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论。”而这正是触发他开始这种探索的肇因。

传播学者迈克尔·古雷维奇和杰伊·布卢姆勒曾经长期跟踪比较传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魅。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



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画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未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播研究的进展，在1975年他们认为，该领域尚处在襁褓期；到1990年，他们称该领域进入了青春期。又过了14年，他们已经在讨论它的“成熟期”了，并称比较研究已经变成“时髦”。哈林对此不敢苟同，在他看来，如果比较研究成了时髦，那也不是它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他认为它仍然处在青春期。

至于该领域为什么蹒跚不前，哈林和曼奇尼的另一个解释是媒介研究界内部的取向和志趣：“多年来，传播的实证研究几乎就是媒介效果范式的同义词，它不关注较大的媒介结构，而致力于特定讯息对个人态度和信念的效果。这可能是比较分析的系统应用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当然，先行者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回报。尽管二位作者在全书中语调审慎而节制，反复说明比较媒介研究是一个开放和刚刚起步的领域，但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受到了非常广泛的称道。哈林以惯常的低调这样谈到他们对学界反应的看法：“我们有些意外的是，人们没有发现更多的错失。我们真的以为人们会发现我们在对特定案例定性中的问题并且说：‘不，你们真的把这个和那个国家搞错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如我们所预期的那么多错失。我们的确小心翼翼——我们将文稿给很多人看。”

二、“三种模式”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根据哈林和曼奇尼的理解，比较分析在社会理论中的作用主要可被理解为两个功能：一是概念的形成和分类，二是因果关系推断。而“大多数有关媒介的文献是高度民族中心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涉及单一国家的经验，却是用普遍性的术语撰写的，好像在该国流行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比较分析有可能使我们留意原来没有留意到和因此没有加以概念化的东西，也迫使我们澄清我们所使用概念的范围和适用性。”至于本书是如何开展比较媒介研究的，做到了什么程度，请读者认真阅读本书第一章“导论”。

既然不相信一小批学者能够对全球各地的媒介体制进行透彻研究，并在获取经验性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比较，哈林和曼奇尼就对研究对象做了限制：限于所谓的“老欧洲”，即属于“西方民主社会”范畴的欧洲的16个大型和中型国家，加上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

即便如此，作者在采集资料和数据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首先



意识到的是语言问题。尽管掌握了英语和罗曼语系（包括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罗曼什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能够研究相关国家的原始文献，直接看电视新闻或读报纸，但是相对于欧洲的语言多样性，这还是不够的，因此该研究在总体上高度依赖二手资料和数据。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学术界的歧见，这增加了作者选择其中具有解释性的理论和观点的困难。

面对各国资料和数据不均的情势，哈林和曼奇尼没有采取减低最小公约数即平均使用有限资料和数据的方式，而是详略结合，围绕已掌握文献进行有重点的论述和阐发。例如，本书相当广泛地讨论了西班牙的案例，而这部分与语言有关。哈林和曼奇尼对西班牙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访谈，阅读了大量文献，因此研究得足够深入。而在其他情况下，要找到英文材料十分困难，尤其是关于那些较小的国家的。

哈林和曼奇尼的思路是，放弃面面俱到的做法，围绕那些反映基本性体制的逻辑，去发现各国不同体制下的共同渊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用他们最为了解的国家来阐发某个特定模式的逻辑。结果收效良好，因为它的确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类似体制。

另一方面，与个体研究和本土学术圈组合不同，哈林和曼奇尼是传播研究领域最早的学术搭档之一。他们一个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工作，一个任教于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长途跋涉和协调沟通也是一个考验。他们承认，“飞机时差反应是共同的挑战”，但是这并非徒劳无益，因为“长途越洋飞行经常是产生新的想法和改进的时机”。

在克服上述种种障碍、从事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经验性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将以上18个国家分为三组，分别归入作者根据四种主要维度——媒介市场的发展、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媒介体制的程度和性质——提炼出来的三种模式之下：地中海或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中欧或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在貌似大一统的西方阵营中划分出这样的不同模式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三、挑战·质疑·误读·回应

那么，本书是不是赢得一边倒的赞扬而没有受到批评呢？非也。第一个质疑便是本书忽略了宗教机构在媒介体制中的角色。对此哈林的回

应是，他们认为宗教相当重要，这首先体现在以碎片化多元主义为特征的体制中。碎片化的起因之一就是宗教，民主法团主义国家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而如果视野超越了本书研究的国家——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宗教就显得更为重要。

而媒介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可能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有关，那就是世俗化。世俗化的基本含义是人们不再依附于宗教团体。而哈林和曼奇尼在本书后半部分既在字面意义上探讨媒介与世俗化的关系，又强调有一种发生于其他类型意识形态团体的平行过程。作者不仅在观察世俗化，而且还看到了宗教重要性的再度崛起，而这是作者所谓的“反向趋势”之一。

本书英文版问世于2004年，当时互联网已经跨越新千年而兴起。而作者既没有涉及计算机辅助传播，更没有讨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角色，这不是一大缺憾呢？哈林承认，这是本书的一个“大窟窿”，其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报刊和广播电视资料尚且难找，更何况相关研究刚刚起步的互联网。实证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是：文献尚不充分和广泛，那么你提出什么问题，如何获取数据呢？而对于比较研究而言，困难还在于：在不同体制之间，互联网的角色可能大相径庭。对互联网的比较分析很有参鉴意义，本书中的分析对于研究互联网、有志于创造出新理论的人将是有益的。

哈林认为，各种媒介体制不是同质的，没有一种体现在所有不同媒介中的单一的媒介体制逻辑。报刊和广播电视是根据多少不同的哲学组织起来的？这种因缘际会与各种媒介在历史上发端的时间、它们发端的历史时代的性质有关，还部分与各种媒介彼此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相对于其他媒介如何定义自身有关。互联网发展于新自由主义时代，其时较老的媒介所根植的政治体制正在崩解，基于有组织社会群体的那种政治文化也在崩解。

假如互联网兴起于七八十年前，它会以大大不同于现在的方式发展。因此，理解语境会有助于分析互联网如何变革。互联网的发展取决于互联网与什么样的媒介竞争，它可能在不同的媒介体制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互联网将媒介文化改变到什么程度，它对现有媒介文化适应到什么程度，而媒介文化在不同的体制下也许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为好。



初读本书，人们可能在三种模式中作出优劣高下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倾向于青睐在英国和爱尔兰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模式和盛行于中欧和北欧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而对宰制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表示不屑。这尤其可能发生在研究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学人中。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对一些人来说，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否定性措辞来定义的，并被定义为一种等而下之的体制，而实际上这种模式最接近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

哈林认为，尽管这样理解不无道理，但是这是对本书的一种误读。他和曼奇尼努力根据其本来面目来理解这种特定的体制。他们明确主张，即便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严重偏离媒介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看法，即便这些国家内部的文献经常是高度批判性的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没有经验性证据明确显示这些体制的实际功能运作是次等的。例如，没有理由说西班牙的媒介不如英国或美国的媒介那么适应民主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

哈林相信，如果读者仔细审视本书做出的论断，就不会认为极化政治体制缺失某些特征，最突出的恐怕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但是，自由主义模式部分是由它不具有的东西定义的：它没有根植于有组织社会群体的媒介史，因为商业性报刊将它们从媒介体制中驱逐出去。它也没有人们可以在其他媒介体制中找到的国家扮演的那种正面角色。因此作者立意公正地呈现不同的媒介体制，明确主张不应该厚此薄彼，分出高下。作者的兴趣在于通过互相比较来全面理解它们。例如，根据被商业性报刊取代的代表性报刊的缺失来理解自由主义体制，那是非常有趣的。

四、媒介体制趋同与反向趋势

要对各国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其前提当然是它们之间要有可辨识的差异。有鉴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一些学者担心，这种差异已经是如此之细微，以至于出现了世界性的媒介趋同现象，因此比较研究不再有意义。本人相信，这也是随着市场化在全世界的推进，许多中国学人非常关注的议题。

因此，除了提纲挈领的第一章，重点揭示和回答上述问题的本书第

第八章“趋同的力量与局限”的分量也随之体现出来。哈林认为，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与分析单位有关，本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就涉及了媒介与国家即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媒介变得与全国性政治体制关联较少，那么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殊就减小了。

另一个问题是真正的差异有多少。媒介体制是不是完全同质化了，以至于媒介文化已经一模一样了？作者的回答是，差异的确已经减小了，但是重要的差异依然存在。当许多人在谈论民族国家消失的时候，学者们发现，国家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本书的一个关键性的论段是，欧美各国的媒介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强力趋向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几年之后，哈林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同时发生在欧美各国媒介体制中的是政治平行性和政党报刊的衰落，而最富戏剧性的是世界许多地方的媒介商业化。有人将这一趋向自由主义模式的论断溯源到本书作者，将他们视为这种立场的捍卫者。但是作者恰恰不这么认为。

今非昔比，三种模式的特性的确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了。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在聚焦于媒介体制趋同的第八章中努力平衡有关论断，指出也有与趋同相抵触的种种强大力量，也不相信不同媒介体制的差异会消失。哈林今天更加强调，趋同具有双向性。因此，在所有其他人变得更喜欢自由主义模式的同时，自由主义国家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像欧洲。最重要的是政治平行性和党派性媒介在美国的重新兴起，其中最明显的场所之一就是互联网。

相信这一点对于中国学界会有不小的启发。根据本书的一个分类，新闻事业有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和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之别。传统上中国的新闻事业是评论取向型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取向型的新闻事业仍然主导了中国新闻界多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西风东渐，崇尚和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在都市类媒体中最为显著。但是，随着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的快速兴起，信息和意见交织的鼓吹型表达似乎又卷土重来。

对于学界的如潮好评，哈林表现得亦喜亦忧。令他欣喜的是，“我的确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期待它得到真正是正面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存在这种间距。我们认为在某个方面它对我们会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没



有竞争者”。而对于纷至沓来的好评，哈林清醒地意识到：“对于这种认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人们会过于热情，会忘记我们的前提条件。我们狠狠批评了《传媒的四种理论》，而我们有点担心……我们会变成《传媒的四种理论》。”也就是说，哈林他们担心《比较媒介体制》被再度神化和教条化，被生搬硬套，而不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

就在本书的校译完成之际，哈林和曼奇尼主编的《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已在2012年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为“案例”和“方法与进路”两部分。正如书名所示，该书的视野扩大到了俄罗斯媒介、波兰媒介、其他东欧国家媒介、南非媒介、以色列媒介、巴西媒介、亚洲媒介、泛阿拉伯媒介等，其中“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媒介体制”一章是由旅居加拿大的赵月枝教授撰写的。该书的一个重点便是探讨在西方世界之外运用哈林和曼奇尼的比较框架能走多远。

展 江

中文版序

出于若干理由，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文版《比较媒介体制》问世。显然，第一个理由与拙著大量增长的发行量及其声誉有关。

当然，这是一个每次出版冒险中固有的非常简单和合乎人性的原因。当我们首次出版《比较媒介体制》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这样的：在一组作为各国多种经验的特征的特定条件之内，将媒介，尤其是新闻事业语境化。首先，我们想质疑单一的“西方”新闻事业模式，并说明即便是在作为本书焦点的相对类似的西欧和北美也已存在的媒介与政治关系上，其发展有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差别。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语境明显地不同于我们研究的西方国家。我们确信，拙著中文版以及我们希望它将引起的辩论会突出世界媒介体制的多样性，并且如何概念化和如何阐释新闻事业可以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媒介在政治过程中可以扮演的不同角色能激发进一步的反思。

拙著基于被称为“最相似体制”的那种设计，而我们已经强调，“三种模式”——“最相似体制”设计是围绕它们而组织起来的——无意运用于超越我们所研究的内容的其他案例，尽管它们作为比较要点可能是有用的。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解释性变量——聚焦于媒介市场、“政治平行性”、新闻事业专业化和国家的角色——更具有一般性，有更宽的适用面。然而，对这四个变量的强调以及我们将它们概念化的特定方式明显是与西方的语境相联系的；而我们确信，它们需要在重要的方面被重新概念化，以运用于理解其他的语境。